

石定果 著

说文会意字研究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说文会意字研究

石定果 著

B7-19 B425 B32.33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文会意字研究/石定果著.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

ISBN 7-5619-0487-8

I. 说…

II. 石…

III. 说文—“六书”—研究

IV. H122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 刷: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7.125 印张

字 数:176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 价:14.00 元

序

王 宁

石定果的《说文会意字研究》一书即将出版，这是大家早已盼望的。她的这本书早于1987年定稿而在8年以后始得出版，也令我感慨系之。

石定果是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上的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也是我国语言文字学领域里的第一个女博士。她的导师黄焯（耀先）先生曾为她题词说：“章太炎谓读书人于天资、学历、家学、师承四者不可缺一，定果于前三者具备，幸其修业之及时也。”其实，耀老说她所有的前三点她实有之，而耀老因为自己是她的老师谦虚回避了的第四点，她恰恰也得到了，这正是她此生更大的幸运。

定果在国学方面的启蒙老师自然是她的父亲，在古典文学上成就昭著的石声淮教授。之后是她的硕士导师周大璞先生。她在武汉大学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工作，主编则是刘博平先生的弟子李格非先生。两年后，她更有幸地成为耀老的博士研究生。令她永感悲痛和遗憾的是，定果在师从黄焯先生作博士之后不久，便逢导师逝世。之后，她得益于耀老和陆宗达先生亲如手足的师兄弟情谊，1984年，得以由武汉大学转到北京师范大学陆先生名下继续攻读学位。她前后从事专业学习的两个学校，都是具有传统语文学肥沃土壤的地方，而在国学上有着惊人成就的黄季刚先生嫡传弟子中尚存的学者，几乎都曾直接或间接地为她的学术生命

序

注入过营养。她为这种命运所驱使，进入了一般人认为女性不宜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领地。

在北师大学习和论文写作的两年多时间，我和她朝夕相处，深深感到耀老对她评价的准确。定果有着非常锐敏的感受力和高强的理解力、记忆力。比如，她跟85级的博士、硕士一起听陆先生讲《说文》，陆先生差不多每隔5—10分钟就会提到一个字，很多是比较生僻的字，总是她第一个翻到，报出这个字在大徐本上的页数，她的这种对《说文》热练的查检速度，常弄得师兄弟们十分紧张。再比如，作论文时，她要对照甲骨、金文逐一分析《说文》的会意字，然后进行分类。分析过程中一发现新的规律，就会导至分类标准的改换，跟着就要重排卡片。令我吃惊的是，不论原有的顺序打乱到什么程度，只要两三天时间，她的新归类便已完成，而且从来没有一张排错过。更使人佩服的，是她做任何一件事时全神贯注的精神。在她忙着分析小篆会意字的时候，传统语言文字学还在受歧视，否定训诂学、否定《说文》的言论常能听到、读到，但定果却单纯到对这些说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地步，一头扎在《说文》小篆里，不知天下有其他事。有些与她合作过的老师告诉我，她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时也这样，干什么就只知有这一件事，永远是不计得失地、义无反顾地投入。这些年，年纪轻一点的人都懂得出版专著的重要，有的博士论文还没经过答辩，就已去交付出版了；定果对会意字的研究是有相当深度的，但她竟把论文放了八年，像是忘了它的存在似的。我想，这一方面是受了长辈们“功夫不到，不要轻易写书”的影响，对论著的要求比较高；另一方面，则是她在调到语言学院以后不遗余力地投入教学和管理工作的缘故。她患着十分危险的病时，竟然没有休息，仍坚持给学生上课；腿摔断了，让丈夫背着她坐自行车去上班，没有一天缺勤。……她完全是在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夹缝里来一点点地审视自己既往的工作。直到我们请她来参加

“小篆构形系统”的课题，才迫使她集中了一点时间再一次本面核实了原先的数据。这使我们感到，站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那个不计个人得失，保存着纯净和奉献精神的，一如既往的石定果。

石定果从1984年起研究《说文》会意字，她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对照出土古文字、穷尽地、逐个分析每一个会意字的基础上，她在这项工作中有以下三方面的创获：

第一，她以构形和造意两方面的标准，对前人所说的会意字，进行了新的界定，划清了会意字与合体象形字、会意字和形声字的界线，处理了一些边缘现象，第一次对会意字给出了操作性的定义，规定了它的外延，因而能准确地统计出这种构形模式在《说文》中所占的比例，使这种由表形构件和表义构件合成的字类，得到了一次有意义的清理。

第二，她突破了拘泥于许慎定义的传统研究方法，采用“构形一功能”两维度的分析方法，对重新确定外延的会意字进行了科学的描写。在描写的过程中，她发现了用这种构形模式构造的汉字的许多重要的特点。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是她发现会意字的构件之间的位置关系很多还与物象一致，这种位置关系影响着字的造字理据，她称这种现象为“关系位”。其实，这正是原始的多体象形字的构形特点的遗存，而没有关系位的完全意化了的模式，则是汉字的构形的又一进化。二是她发现了会意字在拼形的同时所体现的意合关系，与汉语合成词与词组的意义结合关系是完全一致的，这又一次启发我们去思考汉字与汉语的适应关系。这两个特点的发现，都足以引发出汉字构形研究的新课题。

第三，她不是只停留在对每个会意字进行单个考证的微观工作上，而是采用系统论的方法，从会意字的总体着眼，又把总体会意字作为汉字构形全局的一个部分，去观察这种构形模式与其他构形模式之间的关系，因此，她的研究便成为描写汉字的构形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推动了关于汉字的理论研究。

序

这三方面的创获，既是她对传统《说文》学朴素系统论思想的深入学习与继承，又是她锐敏地把形义关系转变为结构—功能关系，运用现代方法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结果。她的思考是扎实而深刻的。

本书的出版是她前一段工作的总结，也是她的又一个重要的开端。我相信，定果一旦再次扎到既往的研究领域和新的课题里，一如既往地全神贯注，她的创获会越来越多。她屏弃功利、忠于事业的纯净会帮助她，她是大有希望的。

一九九五年十月修改

目 录

序	1
一、概说	1
1. 题旨	1
1.1 《说文解字》的篆文体系	1
1.2 “结构—功能”分析方法	4
1.3 《说文》会意字的研究价值	5
2. 原则	9
2.1 严格定义会意字	9
2.1.1 “六书”说	9
2.1.2 成字部件与非字部件	12
2.1.3 独体字与合体字	15
2.1.4 会意字的标准	17
2.1.5 关于“变例”	19
2.1.6 关于“兼声”	25
2.1.7 关于其他非会意字	34
2.1.8 误训字的主要特点	41
2.1.9 会意字定义小结	59
2.2 明确切分下限	60
2.3 平面系联《说文》	64
3. 程序	68
3.1 收字	68
3.2 制卡	69
3.3 鉴别	72
3.4 确立参数项	81

二. 考析	83
1. 《说文》会意字数量考	83
1.1 会意字总表	83
1.2 取舍概况	113
1.2.1 兼声字字表	113
1.2.2 变形字字表	124
1.2.3 由一个成字部件与其他非字部件所构字字表	126
1.2.4 其他误训字字表	129
1.3 古文字材料与书证	148
2. 《说文》会意字层次考	148
2.1 单层会意字	148
2.2 多重会意字	149
3. 《说文》会意字构件考	152
3.1 构件数量	152
3.1.1 独体构件与合体构件	152
3.1.2 部首构件与非部首构件	152
3.1.3 异常构件	153
3.2 构件频度	155
3.3 构件义素	158
4. 《说文》会意字结构考	160
4.1 同体复重会意字	161
4.1.1 表示复数	161
4.1.2 表示强化	162
4.1.3 表示派生新义	162
4.1.4 关系位	163
4.2 异体结合会意字	164
4.2.1 并列结构	165
4.2.2 陈述结构	165
4.2.3 支配结构	166

4.2.4 偏正结构	166
4.2.5 施受结构	166
5. 有关部首考	169
5.1 各部会意字比例	169
5.2 部首的“分形”与“共形”	186
5.3 部首的分布	189
5.3.1 互补分布	189
5.3.2 对比分布	193
5.3.3 自由交替	193
6. 会意字词性考	194
三. 结论	196
1. 会意字的系统性	196
1.1 会意字的区别性特征	196
1.2 会意字的内部规律	196
1.3 “六书”说的可行性	198
2. 从会意字看《说文》形义体系	200
2.1 部首的周遍性	200
2.2 部首的网络性	201
2.3 部首的本义性	202
2.4 形与义的辩证关系	204
3. 从会意字看汉字体系演化趋势	206
3.1 会意造字法溯源	206
3.2 会意造字法的局限性	208
3.3 汉字体系的形声化	208
4. 结束语	209
后记	215

一．概 说

1. 题旨

本书通过对《说文解字》中全部会意字的“结构—功能”分析，探讨《说文解字》所代表的篆文体系的表义基本单位及其组合表义的基本规律。

1.1 《说文解字》的篆文体系

就上位概念^[1]而言，文字是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作为听觉符号系统的语音是语言的第一载体，而文字则是语言的第二载体，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耳治”和“目治”之别。主要建立在印欧语系研究基础上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认为文字不属于语言的要素，不能与语音、词汇、语法等量齐观。但是，汉字体系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布龙菲尔德称汉字为表词文字或言词文字^[2]；赵元任称汉字为语素文字^[3]；裘锡圭称汉字为语素—音节文字。^[4]总之，汉字体系被公认具备表义的色彩，而在早期汉字体系中，这一色彩更为强烈。

汉字体系的发展史划分为早期与后期两个阶段。早期汉字也通称为古文字，它包括甲骨文、金文和篆文；后期汉字也通称为今文字，它包括隶书和楷书。早期汉字体系和后期汉字体系之划分，不仅仅在于时代的先后，而主要在于二者的形体构造与表义、标音作用有显著差异。早期汉字多为写实写意的符号，象形化程度高，表义性突出（形声字的声符和假借字实际上也借用的是象形符号）；后期汉字则笔势化、线条化，不再保留图画的痕迹，同时更加大量地形声化，因此表义性相对减弱。文字学家们对两个阶段的汉字体系是予以区别的，如前者被命名为“象形兼表意文字”、“意符—（借）音符文字”，后者被命名为“表意兼标音文字”、“意符音符记号文字”等。^[5]

篆文上承甲金，下启隶楷，它标志着早期汉字体系的终结，也

呈现出向后期汉字体系过渡的趋势。篆文集中保存于《说文解字》一书中。

《说文解字》训释云：“篆，引书也。”段玉裁注：“引笔而著于竹帛也。”篆文是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书写工具获得改进后的产物。在此之前，汉字的创始和繁衍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年代最久远者经考证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据报道，近年在西安西郊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了一批由原始社会先民刻写的甲骨文，专家们鉴定，比殷墟甲骨文还早一千二百年以上^[6]，这就把汉字的历史追溯到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前。从《说文解字》的篆文看，无论是数量（正篆 9353 个，重文 1163 个）还是质量（形体规整，布局谨严），都说明早期汉字体系至此已成熟化。

《说文解字》的篆文可以称为体系，主要理由有两点：

第一，这些篆文基本上是周秦时代的文字，即具有共时性。《说文解字》问世于东汉，作为其历史背景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学派斗争，前人已多所介绍，且不在本题范围之内，故略而不论。当时隶书通行，古文几近废绝，正处于早期汉字体系到后期汉字体系的更迭阶段。作者许慎从维护古文经学的立场出发，对周秦早期文字加以搜集整理而成此书。他在“叙”中写道：“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这概括了他的收字标准。他所谓“篆文”，指的小篆，或称秦篆，即秦统一中国后为书同文而推行的规范化文字；而“古文”多出自汉世陆续得见的先秦古文经典；“籀文”则源名于《史籀篇》，相传是周宣王时太史籀所撰字书。近人王国维经考证将古文定论为战国时期东土文字，将籀文定论为战国时期西土文字^[7]。二者虽在形体上不尽相同，但毕竟都属同一时代的汉字体系。秦篆与籀文一脉相承，也吸收了古文成分。许慎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按，“之”指代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

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由此可见：秦篆只淘汰了古文中“不与秦文合者”；秦篆直接取法籀文确定字形。古文、籀文、篆文率系周秦间文字（秦二世而亡，仅存16年）。《说文解字》于重文中标识的古文为510个，标识的籀文为223个，但全部正篆不纯然是秦篆，也纳入了某些古文、籀文。（《汉书·艺文志》：“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知秦篆留存至汉初不过三千余字。《说文》中的部分说解也能证实正篆有古籀者，如引古文经为书证，引《史篇》云，或对所出重文标识为“篆文”、“小篆”等。）正篆中尚夹杂着若干汉篆，（如邑部：“鄯，鄯善，西胡国名也。”鄯善本名楼兰王，汉元凤四年更其国名，为之制专字“鄯”^{〔8〕}）甚至孱有后世附益的字（段玉裁统计，大徐本正篆为9431个，比许多原叙所言的正篆数目多78^{〔9〕}）。但总体上说，《说文解字》的篆文反映的是同一时段早期汉字概貌。

第二，《说文解字》对全部字目的编次是有系统的。许慎明确认识到汉字的内部结构规律，在运用“六书说”（详见后文）逐一分析汉字的基础上，创立了部首归字法，使近万篆文的排列有章可循，即如他在“叙”中所说“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部首是许慎“据形系联”归纳所得，共540个。部首既是篆文的构形单位，也是篆文的义类。许慎说：“其建首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可见他以部首来体现篆文形与义两方面的条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表现为整体化、可序化、模型化。以此来衡量，经过许慎独具匠心的处理，《说文解字》的篆文已显示出鲜明的系统性，部首编次就是整体化、可序化、模型化的集中表现。

共时性和编排处理的科学性，使《说文解字》的篆文成为统一的体系。

1.2 “结构—功能”分析方法

“结构—功能”分析是系统论的分析方法。系统论是 20 世纪哲学思维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通常是单向的、纯微观的、静态的，着重从因果必然律的角度进行线性的归纳或演绎；而系统论主张多维的、宏观微观结合的、动态的研究，要求分析与综合同步，保持反馈，辩证思维，以求得出周遍性的可靠结论。具体地说，系统方法是把对象分解为单元，经过定位、定量、定性的分析，再把这些单元重新组合起来。

系统的一般定义是指处在相互关系中的元素复合物，同一系统内的各元素彼此依存也彼此制约。由于各元素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所以系统的总体大于其各部分之和。系统论的定律很多，这里不能一一详述。系统论揭示了事物的内部本质，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科学的方法论，因而获得人们日益广泛的重视和运用。语言学领域中也不例外。事实上，正是语言学家索绪尔于本世纪初在语言学研究范畴首先提出了结构主义的概念⁽¹⁰⁾，尔后其他学科纷纷援用，结构主义遂独立成为专门的哲学理论，并进而发展为系统论。说到底，系统论的渊源乃是结构主义语言学⁽¹¹⁾。

系统论把一切系统分解为元素、结构、功能、环境四方面的要素，其中最关键者是结构与功能。元素是系统的基本成分。结构是元素的组织形式，它具有某种稳定性。功能是结构在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所表现的属性和所产生的作用。结构是物质形态普遍的存在方式，任何物质即使是最微观的，都具备结构，现代科学对基本粒子的深入研究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结构只有成为体系才具有生命力。物质的功能则总是必须依特定的程序即功能序来起作用，否则，所谓功能是混乱的，无价值的。在系统内，结构的有序性决定了功能序。功能存在于结构的运动过程中，这一运动既有结构自身的主动运动，也有人为施加的被动运动。“结构—功能”分析法立足于系统内结构与功能的规律统一。世界

上没有无结构的功能,也没有无功能的结构。通过对结构的研究,来认识功能,描写功能,这是该分析法的目的所在。

1.3 《说文》会意字的研究价值

系统论作为哲学思维的理论被视为本世纪新兴的科学方法论。然而我国传统的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无疑已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进行了网络性或层次式的研究工作。《说文解字》一书就体现了许慎朴素的系统观念;再如反切的发明、四声的离析、声母的归纳、韵书的编排、等韵学的兴起直至乾嘉以降古音学、语义学等方面的丰硕成果。可以说,举凡传统语言学的重大进展都离不开系统性的系联、对照、类比。只是前人对这一方法从理性上认识不足,也不可能始终自觉地、彻底地予以实施。

我们拟采用“结构—功能”分析法,从会意字这一侧面,探求《说文解字》篆文体系的某些形义规律。这一选题是否具有可行性?

前文已论证早期汉字表义特征显著,篆文属于早期汉字,它的形与义是有一定联系的。前文并已论证,《说文解字》的篆文是成体系的,部首排字法只是其系统性的外在表征,本质上反映的是篆文形体与意义的结合的系统性。

我们所说的以形表义,是指借助字形构造来反映赋予该字的初始意义,即本义。

早期汉字基本上是表词文字。证诸典册与铭文,从殷商到战国的书面语汇中,单音词占90%以上^[12],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字就对应一个词,字义相当于词义。这里必须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文字的产生远在有声语言产生之后,从宏观上就整个语言体系的发展史而言自是如此,而且从微观上就个体的词而言,它由在口头语言交际中出现到见于书面,也往往有一段过程。未形成文字以前,词的意义可能已有了种种变化,字的本义未必就是词的最早义源,而只是该词在造字时期的基本意义。其次,字义

(即词义)是运动着的,即通常所说的其概念的扩大、缩小、转移等,然而字形是静止的、相对定型化的,字形无法传达本义之外的引申义、比喻义、假借义等,字形只有负载本义的职能。

许慎的《说文解字》的最宝贵的价值,就在于以因形索义为宗旨,形义统一是贯彻全书的纲。《说文解字》只注本义,这本义是许慎通过对字形的解剖并依据文献语言的实际而确立的,此前的经师训诂,大率随文释义,虽然分析汉字形义关系的六书说早已经建立,但无人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专门化研究。此后的字典辞书,对字义的保存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与《说文解字》一书的性质也有不同。当然,其中的训释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如未见甲骨文、金文等原始文字材料,受阴阳五行、谶纬之说的影响,缺乏对语言历时性的认识等),郢书燕说者在所难免。但是,由于作者许慎所持的朴学作风(“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稽撰其说”、“其所不知,盖阙如也”^[13]),由于他坚持因形索义的指导思想(他对于正篆的选择以笔意为标准,即原则上用最能体现造字意图的字形为正篆),由于这一指导思想来自早期汉字体系的客观事实,由于去古未远、字形嬗变尚有限度,由于《说文解字》的直接目的是维护“经艺之本”,从经典出发再回归经典,所以,本书的义训多是有据的。就文献语言而言,《说文解字》的形义系统总体上是成立的。

我们讲文献语言,因为汉语的历史研究是在文献语言范围内进行的,哪怕是古音重建也有赖于书面材料。萨丕尔说:“一种语言的总沿流有它的深度。表层的速度比较大。”^[14]古汉语文献语言相对口语来说变化缓慢得多,言文脱节的现象延续到本世纪初白话文运动兴起才告终,文献语言是一种深层的沿流。作为有声语言的记录符号的汉字体系也是一种深层的沿流,相对词的音和义的变化来说,词的形(字形)是基本稳定的(尽管汉字发展史有早期、晚期之分,那是整个系统的有规律的演进)。根据处于沿流

深层的早期汉字体系的性质，由字形推求本义的这一原则是可行的。

对《说文解字》在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自有定评，毋庸赘述^{〔15〕}。我们要着重强调的是，肯定《说文解字》，并非盲目地将它奉为圭臬，认为它字字皆确诂，句句是真理，而主要是肯定它所表现的汉字形义的系统性。正因为存在这一系统性，不仅从事词义研究的训诂工作要依靠《说文解字》，甚至识读甲骨文、金文等古老文字时也必须以它为考释的参照系。

历代学者围绕《说文解字》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有关的著述堪称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包括校勘、疏证、补遗、通论……以及由该书入手对初文、声类韵部、义场等的整理。“许学”成为专门之学，而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也推动了整个传统语言学的发展。

学术研究没有终极，人类的认识永远不可能穷尽。今天我们应当使《说文解字》的系统性研究更加精确化、科学化、因为我们有前人的大量成果可资借鉴，有原始文字的材料可供校核，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现代的语言理论，有更先进的系统分析手段。

《说文解字》的形义体系是立体化的，按不同的组合可分解为不同的子系统。例如横向的五百四十部即五百四十个子系统；纵向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等又各自是子系统。《说文解字》的总体系统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本文只是其中的分支。

选择会意为“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对象，是出于下述考虑：

第一，会意字最典型地包括了汉字形义体系中结构与功能这两大要素。

象形字与指事字是一元结构；在篆文体系内，它们不可再切分，只能视为浑然的整体，或称单项元素（指事字的指事记号是